

基督教在促进中美关系改善及中华文化发展上的作用

卓新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100732 北京, 中国)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这在宗教问题上对于特别关注并正确引导基督教为我国和谐社会发展做贡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探究中美关系及基督教在这一关系中的历史经验教训，论述当今中美关系中基督教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以便我们正确处理好目前我们所面临的基督教发展问题，促使其发挥正能量，减少其负面作用，从而使中国基督教能在当前中华文化复兴的伟大发展中起积极作用，有其正面功能。

关键词：基督教、中美关系、中华文化、和平发展

作者：卓新平，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100732。电子邮件：zhuoxp@263.net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与其社会文化氛围相关联，这种关联又因宗教的历史渊源及跨国传播而使之范围扩大，很难就一个国家本身来谈论。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意义及社会定位恰好与这种处境相关。一方面，基督教在中国应实现其“中国化”，达致一种社会适应及文化融入；所谓“在地化”、“处境化”、“本土化”及“本色化”在中国社会氛围中实质上就是“中国化”即适应并融入中国社会文化。但另一方面，又不可能否认基督教的国际关联，而必须正视其信仰体系的“普世性”或“全球性”，看到其作为世界宗教的广泛发展。这样，基督教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中国在今天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发展变化，自然会触及基督教的相关问题。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中，基督教在历史及现状中都有复杂纠结。过去西方列强侵华过程中曾有着基督教的负面参与，留下了许多遗憾和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在我们今天对基督教的反思及反省时是必须要记住的。然而，历史并非一成不变，其发展变化乃超出人们的想象和预期。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努力中，宗教与变化着的世界之关系也是值得我们密切观察和深刻思考的。而基督教在这种思考中理应占有很大比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我们在今天的社会治理及社会发展中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创新思考，尤其在宗教问题上对于特别关注并正确引导基督教为我国和谐社会发展做贡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协调好与宗教的关系，团结广大信教群众，这是我国在新时期发展之“大安全”战略中的一项艰巨任务。而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则不离对基督教的正确举措，因为全世界的基督徒几乎占了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其与众多世界大国或强国都有着社会发展和文化传统上的各种关联，特别是与美国的崛起及发展有着复杂

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对基督教的关系，则很难实现“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的目的。考虑到基督教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特殊关系，我们也完全可以将基督教作为促进、改善中美关系乃至整个中西关系的重要桥梁。这种关系的改善，无论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还是从社会层面、文化层面，都有其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和价值。而中华文化想要真正取得其质的突破和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也有着其开放性地了解、对话、吸纳、融合基督教的任务

中美关系是世界大国关系中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中美友好，则世界和平有了极为关键的保障；中美交恶，世界就会矛盾不断、冲突频仍，不得安宁。其涉及的不仅是中美关系本身，而且还会影响到周边地区是否安宁、跨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发展，甚至决定着整个国际局势的可能走向。在中美关系这盘大棋中，基督教的作用非常独特，其中关涉政治、外交、历史、文化、信仰等内容，特别是双方的基层交往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了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而且，基督教在中美关系史上有着错综复杂的经历，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反思和沟通。必须承认，中美关系在过去有着许多恩恩怨怨，今天的处境也并不理想，而化解其中不少关键矛盾，则与基督教有着直接关联。所以，通过中美对话梳理并分析这些矛盾，通过沟通来化解、消除这些矛盾，在当前乃十分必要，甚至有着其迫切性。大国对话总比大国对抗要好得多，在一个充满政治博弈的时代，大国之间的摩擦及由此导致的擦枪走火对整个世界都非常危险。在这种格局中，世界和平也是我国“大安全”战略所要力争的。对话走向和平，对抗导致危机，因而我们欢迎各种对话，注意防范各种冲突、积极化解任何潜在危机。其中中美对话是世界和平的关键因素，而这种对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审视基督教在中美关系上的参与及其意义，探讨基督教在今天实现中美关系和解并促进中美友好中的积极作用。

回溯历史，中美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有基督教的复杂参与。在“鸦片战争”前后，美国基督教传教士来华传教，随之即与美国对华外交联系起来。例如，1834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在1847年就担任了美国驻华代办，1855年又升任为美国驻华公使，成为当时美国驻华全权代表，是第一位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首要外交官的美国基督教来华传教士。此外，1833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也在1855-1876年之间担任过美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和代办。而20世纪最为著名的美国驻华外交官、在1946-1949年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也是美国基督教来华传教士的背景，他出生在中国杭州，其人生经历了在华传教士、教育家和外交官这富有戏剧色彩的三部曲。1949年之前美国基督教与美国政府对华外交关系及政治定位的复杂联系，使基督教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了现实中国政治。在相应的对比中，我们则看到当时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宋美龄等人皈依基督教也有着明显的美国基督教背景。而且，基督教当时几乎一边倒地政治选位，明确站在国民党一边，也使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基督教的处境发生巨变。司徒雷登本来曾尝试改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坚决反对，并让他立刻回国，故而奇迹没有发生。毛泽东以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标志着当时中美政治及社会关系的中断。当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恶化后，中国基督教直接受到牵连，被社会边缘化、另类化。正是为了走出这一政治窘境，中国基督教才以具有政治色彩的“三自爱国”运动来获得其在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所以说，“三自爱国”不是一种教会建制形式，而乃当时决定中国教会能否继续生存的社会政治参与。尽管如此，中国基督教仍然以其独有的宗教形式而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保持了其与西方社会的文化关系和一定的宗教交往，而其中与美国的联系也依稀可辨。可以说，中美关系在20世纪下半叶因政治原因而恶化，中国基督教也主要因为这种政治变革的挑战而步入其“三自爱国”的发展；与之相关联，虽然中美官方关系在中国大陆中断，其上层交往基本停止，而基督教当时在中国大陆的存在和延续即使中美关系在民间仍以宗教等形式而有着复杂的保留和表现。

20世纪70年代，美国恢复与中国的交往，在中美建交前基督教在双方沟通上显然就起过一定的桥梁作用；例如，美国基督教现实主义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就曾主张美国应

在外交上承认中国，让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1] 在 1972 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在北京担任了中美建交前美国驻华联络办主任，他也因这一特别经历而与中国基督教人士建立起良好关系。而自中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则构成了中美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期间，美国政府支持了至少三次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访华，其中绝大部分为基督教人士，其对中国的客观评价在美国也起到了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作用。一些美国基督教界人士对中国的支持，如美国福音派领袖葛培里等人呼吁美国政府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举动，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为此，江泽民专门会见了葛培理父子，鼓励他们为中美友好多做贡献。本来，中国大陆对基督教福音派有比较负面的看法，认为其不仅保守、而且反共，但葛培理等人对华友好的姿态及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传统看法，而且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教会也通过在美国举办“《圣经》事工展”的合作亦与美国基督教会扩大了联系、加深了了解。所以，中美基督教会本身之间的联系和对话，可以为中美民众的联系和交往起示范、引导和先锋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言之基督教在中美友好关系上的桥梁作用。中美基督教的这种沟通和联系有着其历史渊源，而在今天亦有其发展的巨大空间。

当然，中美基督教的联系及合作受到中美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发展的影响。这些层面的沟通仍然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前途不明；对此，在宗教层面人们也谈到敌视中国的势力利用基督教对中国实施政治渗透、社会分化的问题，而且认为这种渗透主要是来自美国。可以说，美国对我们的渗透、对我们的影响乃是最大的，对之防范亦至关重要。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的存在，看到中美关系目前的窘境和思想意识领域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教会本身的复杂构成和不同影响。为此，有必要开展比较广泛的中美基督教领袖对话，推动多层面、多教派的沟通，这种对话和沟通尤其在当前中国实施开放和走出去的大政方针之处境中就有着独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责任。

基督教在中美关系改善上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如下几点：

其一，根据基督教的“福音”理念和“博爱”精神，中美基督教应在中美两国传播、体现这种关爱，基督教的本质及核心是传播爱、推广爱，而不是增加仇视、敌意。最近美国儿童电视节目谈到美国借了中国那么多债该怎么办时，一个白人儿童“杀光中国人”的回答竟然没有得到节目主持人的及时纠正和正确引导的事件，让中美社会都感到震惊。美国自称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理应体现这种爱的精神和爱的传统；虽然童言无忌，而主持人的认可及麻木却让人不解、失望。美国教会应带动美国社会爱中国人，以当下的爱、善之姿态来缓和当前中美两国的紧张气氛，化解历史上留下的恩恩怨怨。而中国教会也应以其便利条件及合适身份推动中美两国民间交往，开展中美民间外交，培养两国人民大使。所以，以基督教信仰之“爱”来去除中美两国之间的怨恨、敌视，形成一种互信的默契，是中美关系会实现根本改善的信仰基础。目前离这种“互信”仍相差甚远，美国基督教会亦在观望和犹豫；我们必须意识到，只有“爱”才会带来“福”。

其二，在中美政治关系上多做化解矛盾、增加理解的工作，通过教会的影响及人气在社会舆论上促进两国政治和解、积极对话。我们应该尽快改变的一种状况，就是不再把对方“妖魔化”，不要对其政治体制无端攻击或说三道四。例如，一旦进入美国大选时期，美国社会舆论就会拿中国作为攻击对象，一些竞选政治家也喜欢散布“扳倒中国”的言论，使两国关系突然紧张，两国民众彼此不信任的气氛也随之升温。中美改善政治关系是改善一切关系的关键枢纽，具有纲举目张的意义，因此美国教会因促进美国社会去改善其对华关系，而不是无视或推动其恶化。中美政治制度各有其不同传统和社会基础，只能相互尊重而不是以己之治来取代对方，世界的多元当然包括政治的多元共存。于此，基督教在改善

[1] 参见 G. Harland: *The Thought of Reinhold Niebuh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04-205; 以及 *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85, Macropaedia Vol. 13), 75.

中美政治关系上是完全可以大有作为的，希望美国教会能够真正走出这一步。政治对话最为关键，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

其三，在文化和精神上应倡导多元对话、不同宗教及信仰的宽容和包容。记得我第一次到美国参观时美国朋友在一个展示美国历史的博物馆曾给我看了一蝶无景、百蝶多彩的对比图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加之政治、文化信仰的多元呈现，与有着强大基督教信仰传统的美国全然不同。因此，基督教在中美关系上应倡导多元文化对话、多种宗教理解，而不是不顾国情地推行基督教，梦想中国成为基督教国家。其之所以行不通，乃是因为多数中国人认为“中华归主”实际上反映了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占领中国”的殖民色彩，故此才会抵制对中华文化的侵蚀及改变。“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我们虽然是同“球”异梦，却仍可梦异而共在。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交往中，基督教应体会中国“舍得”智慧的精髓，只有“舍”才会“得”，如果舍弃自己的偏见，就能得到真诚的友谊。基督教若以其谦卑而做好了“仆人”的服务，其“先知”的意义则会自然显现出来。美国虽然很强大，美国的基督徒却仍然要奉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基督谦卑精神，做推广多元对话的工作，成为让多种文化、多种精神共存的“仆人”，而不能以自己的信仰为“普世价值”而颐指气使、号令天下。只有文化多元，才能世界大同。

其四，基督教在中美关系上不是要推动其政治选择，而是要践行其社会服务。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分歧在短时期内是很难彻底化解的，不同文化的认同也需要长时间的磨合。因此，基督教应搁置中美关系上的各种争论，先在行动上让大家走在一起，通过近距离接触来增进理解。社会服务本来就是基督教的长处，教会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制度完善、历史悠久，故而可以驾轻就熟，立刻推行。在有着眼见为实、特别是近代以来推崇实用主义传统的中国，人们不是听你说什么，而是看你做什么。基督教只有放下身段，屈己濯足，进行不问收获、只顾耕耘的社会服务工作，才可能“感动中国”，被中国所认可。曾经让美国信服、让世界许多地方皈依的基督教要想感动“神州”，则必须以其“神召”来筚路蓝缕、始于足下。在中美关系上我们还没有陶醉于成功的喜悦，仍必须去付出探索的辛苦。

总之，中美基督教都要以学习、沟通的心态向彼此走近，在改善中美关系、增进中美友谊上起先驱和先知作用，做服务和仆人工作。世界及人类的整体性，却由于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信仰、文化的纷争而被破坏，被撕破为碎片般的存在。在中国的基督教通过各自文化传统的沟通及交流而深知西方二元分割、对立之存在模式的不足，也能体悟中华文化整体统一的智慧。这种整体统一就基于多元共存、和而不同，其实现要靠包容他者、允许不同之存在，要能理解差异或差别、在充满弹性中实现社会的稳态和人心的静态。在目前美国仍是强者，也仍对我处于攻势，对之全方位的化解要靠具有实力的对话，要靠具有政治睿智的博弈和周旋，其中就要运用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文化“软实力”。在此，中国基督教对于我们应该成为具有正功能的文化软实力，参与化解美国社会对我的压力和攻势。而美国基督教也必须认识到美国政治及其文化的相对性，引导美国社会以虚怀若谷的心态来认识世界、认识有着悠久文化传承的中国。因为基督教信仰的缘故，两国的基督徒更容易接近，也更能够理解，这就使其是筑桥者、开路者、探险家。我们欢迎中美基督教能带领广大信众在促进中美友好关系上敢为人先，披荆斩棘，架桥通路，以其信仰实践来创造奇迹、彰显神圣，在积极改善中美双边关系上真正成为两国民众中具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先知和先驱。

The English Title:

The Function of Christianity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nd in Developing Chinese Culture

ZHUO Xinping, Ph.D. from München University, Fellow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Director of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of CASS, Chairman of China Society for Religious Study, Standing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Address: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s,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ianguomen nei Street No. 5, 100732, Beijing, China. Email: zhuoxp@263.net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 Communique points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maximize harmonious factors and to enhance social vitality” . For the issues regarding religion, this has an important guiding meaning in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and in leading Christianity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In the present article I explore the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Christianity in this relationship, and the positive function which Christianity may play in the contemporary Sino-Christian relationship. The aim is that we may deal well with the problems which are faced by Christianity in her development today in China, and help Christianity to have positive energy and to reduce negative effect, and finally Chinese Christianity ma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al revival.

Key term :Christianity, 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 Chinese Culture, Peaceful Development

